

台湾儿女祖国情

蔡子民题

——记厦门的台湾省籍人士

特

◎ 厦门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厦门市委员会
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厦门市政协文史学委宣合编

台海出版社

台湾儿女祖国情

主 编 曾 雄

副主编 洪卜仁（执行）

李拔萃 江菱菱

编 辑 （按姓氏笔画排列）

朱子榕 陈建龙

苑香兰 戴慧敏

台 海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儿女祖国情/曾雄主编：—北京：台海出版社 . 2000.10
书号 ISBN 7-80141-039-4

I . 台 … II . 曾 … III .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 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2096 号

书 名 / 台湾儿女祖国情

主 编 / 曾 雄

责任编辑 / 杨燕民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

邮 编 / 100009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福州诚信达彩印厂

开 本 / 850×1168mm 大 32 开

印 张 / 8.25 印张

字 数 / 207 千字

版 次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数 / 1—3000 册

书 号 / ISBN 7-80141-039-4/Z · 12

定 价 /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张龙峰

历史上，有人把厦门与台湾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鸟的两翼，“厦即台、台即厦”。可见厦门与台湾之关系密不可分。台湾早期的开发多同厦门有关，大陆到台湾的移民，不少是从厦门渡海出发的。1661年，郑成功率军渡海收复台湾时，曾在厦门训练军队，并在厦门点将兴师；而参加复台大军的人员多是厦门、漳州和泉州府所属群众。台湾收复后，他们多留在台湾从事经营和建设宝岛，为台湾的开发立下了汗马功劳。1683年，清政府统一管理了台湾，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因此，福建历史上曾有“九闽”之称。隶属福建之初，由台厦道直接管理台湾。当时台湾与厦门合设道官一员，管理和联系台厦事务。后来台厦分开，设台湾道，专管台湾（包括澎湖），但台湾同厦门的传统联系一直保持着。

厦台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为早期大陆人民，特别是闽南一带群众渡海对宝岛的开发经营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在近、现代史上各个不同时期两地同胞同仇敌忾，为捍

卫家园而互相配合抗击外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英勇斗争中。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割让给日本，引起全国的震动，自那时起，台湾同胞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从未停过。厦门曾是支援台胞反割让反占领斗争的据点和后方，虽然斗争最终失败了，但台湾同胞从未屈服过。当时许多在台的官员、士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避开日本的统治，不愿做日本国的“二等公民”，纷纷内渡祖国大陆，并多在厦门居住，继续组织抗日队伍，坚持抗日活动。与此同时，大批的台湾同胞西渡台湾海峡来到厦门，或经商，或办企业，或行医，或打工，或求学。其中一批热血青年走上了革命的征途，到了解放区，到了延安，为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果说在对日抗战中台湾人没有缺席，在祖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台湾人同样也没有缺席。本书收录的就是反映近一百多年来在不同历史时期来到祖国大陆并在厦门定居或曾经在厦门生活战斗过的台湾同胞的事迹文章。虽然他们每个人所处的年代不同，其人生经历和从事的职业也各异，但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华民族的兴盛而英勇斗争、上下求索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可贵的民族气节却是共同的。所收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炎黄子孙血液里流淌着的那种“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铮铮骨气，洋溢着台湾同胞对自己祖国的拳拳之情。我想，这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千百年来台湾同胞爱国爱乡光荣传统

的延续。阅读本书，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以及两岸同胞那种血浓于水的乡情亲情关系，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台独”的危害性，从而更好地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反对任何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图谋，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感谢本书的编辑和出版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并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敬意。

前　　言

——唇齿相依的厦台关系

洪 卜 仁

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早在宋元时期，就已航运互通。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驻厦门的“南路参将”兼辖澎湖，进一步发展了厦门与台湾之间的往来。此后几个世纪，厦门与台湾区域间的政治、军事、经贸、文化往来，从未间断。

一、联结海峡两岸的通道

台湾本岛与澎湖列岛四面环海，在还没有民用航空的时代，船舶是大陆与台湾之间交往的唯一工具。从大陆赴台湾或从台湾前来大陆，都得先经澎湖停泊。厦门与澎湖相距120多海里，帆船顺风朝发夕至，海路便捷，成为大陆往返澎湖的中转站和联结海峡两岸的通道。

明末，荷兰殖民者侵占祖国领土台湾，民族英雄郑成功以厦门和金门为收复台湾的基地。郑成功复台几个月

后病逝，其子郑经继承管辖台湾，厦门和金门作为台湾与大陆交通的地位依然不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归入清朝版图，祖国实现统一。清政府即在福建省增置台湾府。自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的40多年间，台湾府与厦门联成一体，划为同一行政区域，由同一行政机构“台湾厦门兵备道”统管两地的文武各机关。《台湾府志》写道：“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形象地表述厦门和台湾的密切关系，犹如飞鸟的两支翅膀那样，不可分离。

清初对大陆同胞前往台湾实行严格管制，明文规定：大陆同胞要到台湾，不论是经商或定居，一律须向台湾厦门兵备道申报，经批准领取证件，始得赴台。而且只开放厦门港对渡台湾的鹿耳门港，凡大陆“往台湾之船，必令到厦门盘查”，“其从台湾回者，亦令由澎到厦，出入盘查，方许放行”。其他任何港口，均不准通行，甚至政府间往返的公函文书，也一律要通过厦门转递。这就是说，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交往，厦门是唯一通道。

清政府对大陆同胞渡台的严格控制，既无法满足厦门及其附近地区人民赴台开拓、经营的要求，在大陆的眷属也无法与在台湾的亲人团聚，因而许多人只好冒险偷渡。《赤嵌笔谈》记载，当时“偷渡来台，厦门是其总路”。经过整整100年，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政府才增加开放晋江蚶江与台湾鹿港间的对渡。

据《厦门志》载：自清初到鸦片战争前的100多年间，每年有几百艘甚至上千艘的厦门商船，航行于厦门、台湾海面，称为“台运”。台湾地方政府还特地在厦门港太平桥街设办事机构，厦门人民管叫它为“台湾公馆”。

近代，厦门一直是台湾同胞抗击外来侵略的前线，同时又是后方基地，唇齿相依。在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中，祖国大陆的军民不断从厦门前往台湾协同作战，并输送武器弹药和物资，支援台胞的武装抗英、抗法。在甲午中日战争和反割台斗争中，厦门再次成为大陆军民援台的重要基地。坚持抗日的义军首领刘永福、简大狮等在弹尽援绝的最后时刻回国，都是从厦门上陆的。富有民族气节的台湾士绅在家乡沦日后内渡，也几乎都是先到达厦门然后转赴闽粤各地。除本书里专题介绍的林尔嘉、林祖密等家族外，还有著名诗人林鹤年、施士洁、许南英以及王选闲、卢心启、蔡谷仁、胡南溟、林朝崧、卢振基、魏绍英等家族或兄弟好几百人，分别定居厦门和漳州、泉州，致力于地方的经济、文化、教育工作。

自1895年4月至1945年9月，台湾沦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殖民地整整半个世纪。由于台湾居民中祖籍闽南的占人口总数80%以上，这种地缘和血缘的因素，决定了日治时期台湾继续保持与厦门的航运畅通。厦门仍然是闽台往来的重要口岸。有资料揭示，1913年台湾来厦旅客5660人，1915年增至6031人；1913年厦门赴台旅客5313人，1915年增至5947人；1933年到1937年10月，居住

厦门的台胞达 8700 多人。他们绝大多数安分守纪，都有正当职业，与厦门人民相处融洽，如医生蔡世兴，工商业者廖昆维、郭水生等，不计其数。但也勿庸讳言，有那么一小撮甘心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充当日本侵略者走狗的日籍台湾浪民，如所谓“十八大哥”流氓黑社会头头，依仗日本领事势力，为非作歹，欺压同胞，罪恶昭彰，令人发指。

二、区域经济贸易往来

著名的台湾史学家连横指出：“历经五代，终及两宋，中原动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口。”明初采取海禁政策，一度导致两地区域贸易的萎缩。及至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发达，厦门及其邻近沿海的商人，又纷纷集资造船前往台湾贸易了。

在荷兰殖民者窃据台湾期间，台湾同胞的生活用品，主要仰赖厦门供应。例如荷兰人的《大员商馆日志》记载，1637 年 6 月～12 月大陆开往台湾的 19 艘帆船中，有 14 艘是自厦门出港的，同一时间段从台湾返航大陆的 15 艘帆船中，有 9 艘属于厦门船；1638 年 1 月～11 月赴台的 22 艘大陆船，其中厦门船 15 艘，同一时间段台湾返航大陆的 20 艘帆船，厦门船占了半数。

1662 年 2 月，郑成功率师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从厦门跟随郑成功东征的几万名闽南子弟兵留在台

湾，繁衍子孙，为台湾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郑清军事对峙期间，闽南沿海的商人将货物运入厦门，与来自台湾的商人贸易，而驻守厦门的清军，却睁一眼闭一眼，让双方成交，使“台湾货物船料，不绝于用”。由此可见，即使在郑清处于敌对状态时，厦门与台湾的经贸往来，明禁暗许，始终没有完全断绝过。

祖国的统一有利于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清初，台湾盛产的大米、蔗糖、樟脑，源源不断地通过厦门转输大陆各地，并通过厦门采买台湾同胞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厦门志》记载：“厦门商船对渡台湾鹿耳门，向来千余号。”1725年福建巡抚毛文铨在呈送雍正帝的一份报告中说，“每年至少有500到700艘台湾商船停靠在厦门，而实际数量可能还不止。”出现了台湾海峡“船舶相望，络绎于途”的盛况。仅鹿港这个口岸，就有专门经营与厦门贸易的“厦郊”100多家。

鸦片战争后，台湾与厦门的经济来往仍很频繁。厦门海关《十年（1882～1891）报告》明确指出，“厦门一直是运往台湾货物的集散地。台湾的贸易往来大部分经过本口岸。”

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间，厦门与台湾的贸易，虽然继续发展，但已不再是国内的区域贸易而转化成为对外贸易。

三、台胞抗日爱国运动的大本营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以后，不甘心受日本军国主义

奴役的台湾同胞，前仆后继地开展抗日斗争。厦门成为台湾同胞联络祖国亲人并肩抗日和从事民主爱国运动的大本营。

1904年至1905年间，厦门各界人士响应全国各城市掀起的反美爱国运动，成立“拒美约会”，1895年内渡定居厦门的连城璧出任书记（秘书），具体负责日常会务和宣传工作。当年担任厦门《福建日日新闻》报笔政的，是台湾名诗人、史学家连雅堂（连横）。他不仅大量刊登各地反美爱国运动的新闻，还著文抨击美国虐待华工的滔天罪行，鼓舞群众的斗志。

在厦门参加中国同盟会的台胞罗福星回到台湾后，在台湾发展中国同盟会会员并组织台湾同胞响应祖国的辛亥革命，投身民主爱国运动的行列。在辛亥革命推动下爆发的林圮埔起义、土库起义和西来庵抗日起义，部分武器是从厦门运去的，给起义很大的支援。而在厦门的台胞，也纷纷参加光复厦门的战斗，其中如许南英的儿子、作家许地山的胞兄许赞元，以及徐家三兄弟徐萌山、徐蕴山、徐屏山。从清末至民国19年（1930年）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收回海后滩英租地”的斗争中，在厦门的台胞黄鸿翔、卢心启、王选闲等，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卢心启还作为厦门公民会两位代表之一赴京、沪等地请愿，争取全国同胞对收回厦门海后滩的支援。

“五四”运动期间在厦门工作的赖和、张我军及其后在集美中学念书的郭秋生，受到“五四”运动的熏陶，回

台湾后从事文学创作，鼓舞台胞的抗日爱国热情。台湾新文化运动的这几位先驱，在他们的作品或自传里，都忘不了厦门这块土地对他们的哺育。

台湾青年回祖国求学深造，几乎都取道厦门。二三十年代，汇集在厦门的台湾学生一百多人，他们受到祖国民主革命运动高潮的影响，有的集合同志，组织革命社团，有的参加中国共产党，进入游击区当红军。1923年6月20日，台湾人李思祯在厦门组织“台湾尚志社”秘密进行抗日活动，8月15日，出版《尚志厦门号》。翌年1月30日，尚志社在厦门召开“台湾学生大会”，并发表《宣言》和《决议》，寄发台湾、东京和国内各地的台湾同胞，号召共同反对台湾总督府的压迫政策。继而，在厦门的台湾学生洪朝宗、郭丙辛、曾明如等，又组织了“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1925年，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与“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互相联络，进一步推动抗日运动的开展。其后，台湾学生林茂铎、张梗（张志忠）等又联络厦门的学生，共同组成“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于1925年4月18日、24日，两次在厦门市内各处张贴《宣言》。《宣言》在控诉日本统治台湾血腥暴行的同时，呼吁“中国同胞有爱国思想者，当然也要负起援助台湾的义务。”同年6月间，又以“中国台湾新青年社”的名义，在厦门发行报纸。而在厦门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台胞李山火、施至善、洪石柱、洪石笋、洪平民、卢丙丁、冯志坚、施晓清、余南、苏鸿树、李顺英（李纯青）、廖青、李伟光（应章）、李克

己、张智赫（张秋山）、骆奇峰、谢瑞生等，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献身祖国和家乡台湾的解放事业。期间，台湾岛内外抗日运动的领袖和骨干如林献堂、蒋渭水、王敏川、苏新、黄朝琴等，也都先后到过厦门进行活动。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日本驻厦门总领事馆于8月28日关闭，居住厦门的台湾同胞获得了长期被剥夺的爱国权利，约有三四千名住厦台胞，不顾驻厦门日本总领事馆的威迫，抗命不随日本总领事撤退回台，首批400多人向政府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许多台湾同胞受到全国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的鼓舞，主动要求参加祖国的抗战行列，由宋重光、游新民、叶永隆、王任本、潘文村、朱枫等发起的“台湾抗日复土总同盟”，于9月4日在厦门成立，他们“以团结全体台湾同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恢复台湾领土”为宗旨，提出“全国抗战也就是我们台胞发挥热血”、“与祖国同胞站在同一战线，用火与血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斗”的口号。

厦门沦陷后，厦门“台胞抗日复日总同盟”的成员，有的奔赴内陆参加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在祖国抗日前线担任“日军俘虏营”的翻译或从事战地的救护工作。有的继续隐蔽在厦门，改名换姓组成“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与厦门青年组织的“厦门青年复土血魂团”联合作战，一起散发抗日传单，袭击日军军事要地。他们坚持抗日爱国的正义斗争，最后与全国同胞一起取

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从而实现了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夙愿。

四、厦台关系的深化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0月2日，第一艘进入祖国口岸的台湾商船，抵达厦门港。此后4年，厦门与台湾之间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

1945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贸易公司，恢复厦门与台湾之间的区域贸易。27日，厦门、台湾直达电讯开通，邮政业务量骤增。翌年2月，先后四批旅厦台胞共3503人回乡探亲或定居。4月15日，厦门与台湾开始有轮船定期航班。5月，厦门与高雄海运开航。中央、中国两家航空公司也相继开通厦门至台北、厦门至台南的航线，使厦台间的交通更加便捷，有利于两地各方面的交流和台湾青年前来厦门升学。12月23日，厦门大学新生院还特地为台湾省籍学生开办国语、国文补习班。据不完全的统计，1946年初到1948年间，前来厦门大学就读的台湾学生大约有50人，而厦门大学毕业的学生应聘到台湾工作的，三四年间，大约有500人。在厦门大学就读的台湾省籍学生如林江（翁黎光）、郑洪池（郑坚）、张有义（张克辉）等，都是在学运中经受考验被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后来还进入闽南的游击区，投身于解放战争的革命洪流，有的经几十年的磨炼成长

为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人。

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导致厦门与台湾之间关系紧张，乡音隔绝。近20年来，海峡两岸气氛日趋缓和，有利于厦门与台湾之间各项关系的发展。许多台胞在厦门投资设厂办企业，并在厦门举办形式多样的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厦门已成为大陆各地台资最集中的地方和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辐射点。

目 录

序	张克辉 (1)
前言	洪卜仁 (1)
在厦门的台湾学生运动	蓝博洲 (1)
李友邦将军与旅厦台胞	陈支平 (28)
抗日举人李应辰	李明滨 (36)
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记我的曾祖父汪春源	汪 舟 (43)
载誉海峡两岸的林祖密将军	林为民 (48)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李克己	陈亚芳 占国充 (58)
爱国史学家和诗人连雅堂	张宗洽 (65)
英勇斗争坚贞不屈 ——翁振华烈士传略	
肖 虬 杨锦如 王炳南 许伟平 (73)	
“台湾文学之父”赖和	张宗洽 (89)
为台湾回归祖国而终生奋斗的翁俊明	
蓝攻珲 江林宣 (96)	
爱国前辈黄鸿翔	黄启巽 (104)
宁死不屈的英雄汉 ——林松龄	
黄坤胜 (111)	
把青春献给党 ——记台籍烈士伍文祺事迹	
黄坤胜 (121)	